



现代经济学研究丛书

中国投资海外耕地的国别选择研究 ——以粮食安全治理为分析视角

王 蕾◎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投资海外耕地的国别选择研究 ——以粮食安全治理为分析视角

王 蕾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投资海外耕地的国别选择研究:以粮食安全治理为分析视角/王蕾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1.12

(现代经济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680-7744-6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耕地-海外投资-研究-中国 IV. ①F32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1)第 251272 号

中国投资海外耕地的国别选择研究
——以粮食安全治理为分析视角

王蕾 著

Zhongguo Touzi Haiwai Gengdi de Guobie Xuanze Yanjiu

—yi Liangshi Anquan Zhili wei Fenxi Shijiao

策划编辑:周清涛

责任编辑:苏克超

封面设计:原色设计

责任校对:张汇娟

责任监印:周治超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电话:(027)81321913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邮编:430223

录 排:武汉楚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2.5 插页:2

字 数:240千字

版 次:2021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58.0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与经济学院酝酿已久，拟出版一套现代经济学研究学术著作，现在终于正式启动了。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在张培刚、林少宫等老一辈经济学家的带领下，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坚持国际化的办学方向，以西方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两个学科点为基本，积极跟踪现代经济学基础理论和方法的前沿进展，并贯穿在教学和科研的全过程之中，在经济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们希望利用我校经济学科在国内外的影响，以我校经济学院的教师和博士生为基本作者队伍，同时积极联络国内外的同行加入，比较集中地出版一批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专著，这对于促进我校经济学科的学术研究、提升学术水平，并加强与国内外同行的学术交流合作，将是一个有力的推动。所以，非常感谢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们！

希望这套现代经济学研究丛书的出版，能够在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计量经济学、金融学、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现代经济学的主要领域，在基础理论和方法、前沿进展和对现实重大问题的应用研究方面，推出一批学术精品，为繁荣我国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做出一点贡献。



中国投资海外耕地的国别选择研究 —— 以粮食安全治理为分析视角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将本着“质量第一、对外开放、不拘一格”的原则来推荐和评审进入该丛书的作品，经济学院将给予必要的出版资助，欢迎校内外的同行们积极投稿加盟！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徐长生

2012年10月于武昌喻家山

2020年8月修改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在丰衣足食的日子,人们很难关注“粮食”,更难关注生产粮食的“耕地”,然而自古以来对于粮食及耕地的重视,是历朝历代都尊重的主要法则。早在西汉时期的《汜胜之书》——中国最早的一部讲授农业生产经验和操作技术的农书,专门强调“和土”的重要性,即为作物生长创造一个结构良好、水分、温度等各种条件相互协调的土壤环境,以充分发挥“地利”。2020年6月25日,第30个全国土地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加快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实落地。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国人的饭碗将端得更稳、更好、更久。据统计,2010年以来,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持续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19年超过470千克,远远高于人均400千克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三大口粮——大米、小麦、玉米的国内自给率平均在97%以上。年年丰收、自给自足的背后,是我国粮食消费量的增长仍快于产量的提高,粮食生产和消费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快速的城市化仅仅发生在过去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与此同时,城市化极大地改变了粮食消费模式,这反过来又决定了需要多少耕地来匹配增长的人口的粮食消费。如果再纳入土地“过劳”、土壤污染和粮食能源化等因素,上述的“紧平衡”将更加令人担忧。将视野投向其他空间,利用他国土地确保本国粮食安全的投资模式成为诸多政府、企业的逻辑必然。特别是在2007—2008年全球性粮食危机后,这种跨国的耕地交易和获取经久不息,当然也饱受诘难。海外耕地可以理解为耕地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东道国投资者从国外引进资金,租用农田,在目标国雇佣工人从事农业生产,生产出来的作物可以在目标国市场上销售,可以汇回东道国,也可以出口到世界市场。这场“土地争夺”中表现突出的不仅有美国、英国等传统的农业资本输出大国,韩国、日本、印度及一些海湾国家等也加紧投资海外耕地。中国的耕地利用有着结构性矛盾,耕地资源有着生态性不足。另外,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看,粮食不仅是用来吃的,更是用来平衡势力范围、进行国家博弈的武器。与其被动等待,不如自己主动“走出去”,以资本投入,技术合作、提供援助等形式获取国际粮食供应体系中的话语权。

本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研究的。目前国内尚无系统研究海外耕地投资国别选择问题的著述,因此本书的研究内容在海外耕地投资研究领域内具



中国投资海外耕地的国别选择研究——以粮食安全治理为分析视角

有开拓性和系统性。为了获得科学的结果,研究并未采取完全规范式方法,而是对 GRAIN 发布的海外耕地投资四百余个案例进行整理,将归纳出的数据资料和他国海外耕地投资历史结合起来,提炼这些国家国别选择的不同模式,并分析不同模式产生的地缘原因,目的是论证一个国家采取某种国别选择模式是由其地缘环境特征和地缘战略的实施所决定的,这在以战略资源为投资标的跨国经营中尤为明显和重要。不仅如此,秉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和农业生态适宜性原理,本书构建了中国投资海外耕地国别选择的战略和海外耕地投资环境评价框架;首次将“潜在耕地”定义为没有被森林覆盖,没有被设为保护区,且人口密度每平方千米少于 25 人的适合 5 种基本农作物种植的区域土地,据此筛选出 37 个具有“潜在耕地”的投资目标国;结合数据分析结果提出中国要建立安全、稳定、持续的双层全球耕地资源供应体系的国别选择目标,以及“双圈一多点”耕地利用实施路径。

在整个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很想让人们直观感受 400 余个耕地投资案例实施细节,当然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所以本书难免存在错漏与不足,恳请有兴趣“耕耘”此领域的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得到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资助出版。

作者

2021 年 6 月

第一章	<p>绪论 1</p> <p>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1</p> <p>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述评 11</p> <p> 第三节 研究框架 19</p>
第二章	<p>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3</p> <p> 第一节 海外耕地投资的界定 23</p> <p> 第二节 地缘理论 28</p> <p> 第三节 可持续发展理论 34</p> <p> 第四节 投资环境评价方法 36</p>
第三章	<p>世界耕地资源分布及海外耕地投资国别选择现状 39</p> <p> 第一节 耕地资源的全球战略地位 39</p> <p> 第二节 世界耕地的地缘分布 44</p> <p> 第三节 海外耕地投资国别选择现状 54</p>
第四章	<p>典型国家投资海外耕地国别选择模式的地缘分析 67</p> <p> 第一节 美国投资海外耕地的全网式国别选择模式 67</p> <p> 第二节 日本投资海外耕地的平台式国别选择模式 73</p> <p> 第三节 韩国投资海外耕地的 FTA 国别选择模式 82</p> <p> 第四节 投资海外耕地国别选择的地缘经验借鉴 88</p>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一、全球粮食供给紧平衡下的海外耕地投资热 ▶▶▶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贸、安全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增加。这一宏观格局使得 21 世纪初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战略学界即有了“权力大角逐”这样的概念，在时事背景的映射下更显突出。将这个概念及各国的表现加以综合归纳，可以说，这 10 年来世界上的主要国家不仅进行科技角逐，事实上也正在进行一场“资源战”。强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策略都是围绕着“资源”^①这个核心而展开的。获取资源的“战争”不再直接表现为地理空间的军事占领，而是实力大国充分发挥资本力量在全球和地区范围内谋求地缘优势地位。本文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展开选题研究的。

1. 历史上两次粮食危机的应对之举

近半个世纪，人类经历过两次全球范围的粮食危机。一次是 20 世纪 70 年代初，由粮食生产和出口国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以及苏联突进国际粮食市场的行为造成国际粮食市场供应紧张，继而引发的 1974 年粮食危机。另一次则是发

^① “资源”是指一国或一定地区内拥有的物力、财力、人力等各种物质要素的总称。资源可分为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两大类。前者如阳光、空气、水、土地、森林、草原、动物、矿藏等；后者包括人力资源、信息资源以及经过劳动创造的各种物质财富。本文中有关“资源”一词如无特别说明，均指自然资源。



生于 2007 年下半年并于 2008 年初全面爆发,至今仍给世界经济和社会带来剧烈、深远影响的 2008 年粮食危机。相同的是,这两次全球粮食危机都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给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国家带来严重危害,陷于危机中的人们面临着大幅度的粮价上涨,锐减的库存,以及饥饿和贫困。不同的是,面对两次粮食危机,各国采取了不同的应对举措。

1974 年粮食危机发生后,各国都注重农业生产领域的发展,以“绿色革命”为契机,加大农业投入,改善基础设施,同时加快本国粮食市场体系的建设,维护正常的流通秩序。换言之,1974 年世界粮食大会主题报告认为,粮食供应问题是粮食不安全的主要原因,但是,这种关注供应的局限性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困扰非洲的粮食危机中暴露出来,范式转变为探索个人和家庭的粮食安全,而不是从国家的角度来探讨粮食安全。2008 年粮食危机不再仅仅停留在饥饿和贫困层面。急速攀升的粮价已在世界各地引起人们的心理恐慌,以非洲地区为主的 30 余个国家因粮食短缺、粮价攀升而陷入通货膨胀、社会动荡的泥沼。粮食危机带来的影响已从经济层面向社会、政治层面衍生。部分国家为确保本国粮食安全采取了两套方案:一方面通过限制粮食出口,取消大农作物进口关税、提高出口关税、增加种植面积等方式夯实本国粮食稳定供给基础;另一方面将视野拓展至全球,通过资本输出的方式,加快利用他国耕地资源的步伐。自此,“海外耕地投资”在众多资源类型的产业外向发展中异军突起,引发了一轮全球土地交易热潮。

2. 海外耕地投资的兴起与发展

到国外寻求土地的先例早已有之。帝国通过夺取领土,扩张地理版图。他们在殖民地建立种植园以及农业综合企业,以扩大其统治范围和对该地区的控制(布朗,2012)。在外国土地上以市场为导向的投资可追溯至 19 世纪中叶,过去一百多年中,来自工业国的大规模农业投资主要集中在热带产品上,如甘蔗、茶叶、橡胶和香蕉(Thomson,2011)。而当前对国外土地新的投资热潮,则是为了生产与获得更多的满足人类需求的基本食物和饲料作物,包括水稻、小麦、玉米、大豆,以及生物燃料。这种土地购置,有时也被称为“土地获取”(land acquisition)或“土地争夺”(land grab),代表以确保本国粮食安全为目的的食物短缺的地缘政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规模和发展步伐前所未有的。

这场“土地争夺”中表现突出的不仅有美国、英国等传统的农业资本输出大国,韩国、日本、印度及海湾国家等也加紧投资海外耕地。谷物进口超过 70% 的韩国表现突出。韩国政府帮助国内公司在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乌克兰等国租赁农田或购买当地农业企业的股份,韩国计划到 2018 年时在国外购置 38 万公顷农田,用于生产玉米、小麦和大豆(Kwon,2014)。拥有庞大且不断增长的人口

要养活的印度,也是海外耕地投资的活跃者。预计到 21 世纪中叶印度人口将再增加 4.5 亿,随着灌溉水井开始干涸,加上气候日益不稳定的前景,印度政府十分担心未来的粮食安全。在印度国家贸易公司的统筹下,15 家企业于 2008 年伊始便展开了与南美巴西、巴拉圭等国及东南亚印度尼西亚、缅甸、马来西亚等国的耕地转让和租赁谈判(Cotula,2009)。过去一直严重依赖粮食进口的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曼、约旦和阿联酋等国在 2007 年至 2008 年的粮食危机中痛定思痛,组成了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携手在海外寻找屯田机会。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4 年的新闻报道称,其“标的”国家是老挝、印尼、菲律宾、越南、柬埔寨、巴基斯坦、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中亚和欧洲的乌克兰、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俄罗斯及土耳其都达成或正在磋商租地、购地协议。

本轮全球土地交易热潮的官方信息很难获取,主要原因在于土地和粮食的政治敏感性和交易过程的保密性。不过不断增加的新闻报道似乎表明这类事情越来越多,这其中 GRAIN 作为致力于支持小农和社会运动争取社区控制和基于生物多样性的粮食系统的国际非营利组织,为海外耕地投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2010 年一份备受关注的世界银行报告,也使用了该网站在线收集的信息。世界银行在其报告中证实,全球范围内共有数百个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土地购置项目,其中 20% 的项目已经开始进入生产阶段,其他由于基础设施技术和机构的欠缺还在缓慢进行中(World Bank,2010)。这些土地交易项目的近一半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部分原因是那里的土地比亚洲便宜得多;位居第二的土地购置地区在东南亚,包括柬埔寨、老挝、菲律宾等;也有不少国家在拉丁美洲寻找土地(World Bank,2009)。当然,这种土地跨国交易也备受国际学界和媒体的抨击:这种类型的投资交易过程不透明,主要利益相关者——当地农民,不仅不能参与交易过程,而且往往直到协议文件被签署、自己要被迫背井离乡才知道协议的事情(Lipton,2009)。另外,高度机械化的农场只需雇佣几个人,那些既失去土地又失去生计的村民会加入世界饥饿人口行列(Lian & Wilcove, 2010)。同时,现代化农业的大规模同一种植无疑会破坏当地的生态多样性,造成生态危机(Hertel et al.,2010)。

由粮食危机这根导火线引发的海外耕地投资热,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人类在不同时代面临的资源环境和资源诉求不一样,世界正从粮食丰盛年代向荒歉年代转变。半世纪前,世界人口只有 25 亿,农业的主要问题是生产过剩,世界粮食储备平均达 96 天。世界作物收成良好时,作为耕地储量大国的美国会休耕更多的土地。然而在 21 世纪的去 10 年间,世界粮食储备平均只能满足 74 天消费,已减少了近三分之一,人口却已增加至 70 亿,未来还将进一步增加。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和生物质能的发展亦促使粮食刚性需求不断增长。国际权威机构



普遍预测,虽然今后由于国际粮价的上涨会刺激粮食生产的增长,但国际粮食价格将继续维持在高位运行(FAO,2011)。相关数据显示,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2020年全年联合国粮农组织谷物价格指数平均为102.7点,较2019年上升6.4点(6.6%),创2014年以来的年均指数新高。紧缩的供应和强劲的需求推高了小麦和玉米价格,与2019年相比分别上涨5.6%和76.0%。大米2020年的全球进口需求疲软,但出口价格仍然比低迷的2019年增高8.6%,创6年内的新高。

国际关系永远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世界政治、经济交往中,权力的本质永远是“丛林法则”。各国为了扩大国际影响力,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和经济利益,在本国粮食安全的权衡下,海外耕地投资即便饱受抨击,仍会继续下去。

二、关于中国是否已参与海外耕地投资的讨论 ▶▶▶

国际学界和媒体在讨论海外耕地投资时,有一个现象十分引人注目:几乎所有的西方学者、媒体都不约而同地将中国归入当前海外耕地投资主要的东道国。认为当前跨国土地交易中,最大的“玩家”是中国和海湾国家,其他如印度、韩国、日本、马来西亚等也都在国际空间范围内搜寻肥沃的农地。另外,全球化的发展和空间的异化是促成当前海外耕地投资热潮发生的直接动因,也使耕地转变成一种战略性资源,这种转变在中国实施这类投资的举国战略中尤为明显(Filer, 2011)。Cotula(2012)认为,基于粮食安全和资源需要,中国的视野已经拓展到了他国土地之上。目前,中国已有30多家企业参与跨国土地投资,这基于本国政府新的地缘策略和“农业走出去”投资战略的制定与实施(Borras, 2013)。国际学界不少学者认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是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战略的核心地带,因为这里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耕地资源储备,来自中国的投资者已经在那里进行了数年大规模的土地交易。

与国际学界的认知相左,中国政府明确表示没有制定或实施任何海外耕地投资战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和农业部国际合作司曾于2008年申明:中国政府支持有实力的投资主体与外国开展多种形式的粮食和经济作物种植方面的国际农业合作与援助,但中国并没有任何“海外屯田”的计划,中国的粮食安全一直以来并且将继续植根于国内粮食生产来保障。事实上中国不仅没有将海外耕地投资当成举国战略来实施,反而在这类投资中,自身也成为被觊觎的对象。2011年5月,日本3家世界500强企业(朝日啤酒、住友化学、伊藤忠商事)共同出资,与山东莱阳市签订了一份涉及上千亩耕地的农地租赁合同,瞄准高端市场,进行有机作物的种植。此项投资表明日本正式进入跨国农业生产环节,打破

了以往外商投资产业集中在加工及销售环节的模式(邱林,2011)。如果将大豆也算作粮食产品,那么,一些海外的农业巨头早就在中国的黑龙江等黑土资源丰富的地区进行布局,且掌握了上游的话语权。

造成国际学界鼓噪中国的“海外耕地投资”以及国际与国内认知相左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国际学界狭隘地将中国农业“走出去”战略等同于中国正在进行“海外屯田”;另一方面,出于对中国强大经济的心理压力,西方刻意产生了排挤和歪曲的心理和行为。不可否认,基于利益追求,中国有少数企业和个人已经开始“试水”海外耕地投资。北大荒集团在2011年就向阿根廷里约内格罗州政府提交了农业合作意向,承诺将在未来20年内投资15亿美元,开发30万公顷的耕地,种植大豆、玉米;2012年,联想农业投资事业部改组成立佳沃集团,在南美洲寻找农业合作项目。另外,网络信息显示,不少个体商人也北上俄罗斯、南下非洲进行海外农业的开发。在海外耕地投资中,中国商人走在政府的前面,但这只是个别企业的个别行为,无法与部分国家的举国战略相比。因此,本研究的背景之一是中国还没有以国家战略形式参与当前的海外耕地投资热潮。

三、中国投资海外耕地的必要性 ▶▶▶

1. 粮食缺口逐渐显现

与全球粮食危机的暴风骤雨和国际粮食市场吃紧相比,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多年来似乎一直位于粮食“安全区”,拥有超过5亿吨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粮食储备远远高于粮食安全警戒线。这种安全形势的持续,原因之一在于多项政策举措的调控和落实。早在1990年,我国就决定建立国家粮食库存,目前已建立了中央储备与地方储备相协调、政府库存与企业库存相补充的体系。2015年,我国引入了问责机制和详细的评估标准,要求所有省(区、市)领导对当地粮食安全负全责;为了保护有限的土地资源,设定了全国耕地总量的最低标准为1.2亿公顷;还制定了到2020年建设5300万公顷“高标准农田”、到2022年再建设6670万公顷的目标,这些农田都将用于大规模机械化耕作,以提高作物产量。2019年发布的《中国粮食安全白皮书》数据显示,我国粮食总产量2010年突破5.5亿吨,2012年超过6亿吨,2015年达到6.6亿吨,连续4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水平;2018年产量近6.6亿吨,比1996年的5.0亿吨增产32%,比1978年的3.0亿吨增产120%,是1949年的1.1亿吨的6倍。

这些傲人的成绩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粮食安全可以高枕无忧。1984年以来,中国人均占有粮食相对稳定,但由于动物性食品增加较多,人民的营养水平明显



改善,平均每人每天供给的热量达到 2727 大卡,蛋白质和脂肪分别达到 70 克和 52 克,高于同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国家,基本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由于食物构成的变化,直接食用的口粮将继续减少,饲料粮逐渐增加。官方数据显示,2012 年,国家三大主粮净进口总数为 1900 万吨左右,接近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13 年黑龙江产粮大省 2121 万吨的粮食总产量,其中小麦的进口总量达 650 万吨,是除埃及外,全球最大小麦进口国。2015 年以来,我国粮食进口量维持在 1 亿吨以上。2019 年我国累计进口谷物和谷物粉 1785.1 万吨,进口大豆 8851.1 万吨,同比增长 0.5%;进口食用植物油 953.3 万吨,同比增长 51.5%。2021 年,海关总署公布的 2020 年全年进口数据显示,2020 年 1—12 月我国粮食累计进口 14262.1 万吨,同比增加 3117.5 万吨,增幅达 27.97%。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粮食安全,立足于自力更生,粮食连年丰收、库存充裕,但粮食安全的基础仍不稳固,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十四五”(2021—2025 年)期末,有可能出现 1.3 亿吨左右的粮食缺口,其中谷物(三大主粮)缺口约为 2500 万吨(中国社会科学院,2020)。

2. 耕地资源紧缺,优质土地不足

很明显,以玉米、大豆为代表的饲料生产面临着土地资源有限的障碍。耕地面积日益减少,后备资源短缺,加上没有粮食规模化生产,国内粮食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国内三大主粮净进口的局面在短期甚至长期内可能均会处于“不可逆”状态。主粮进口常态化局面背后是中国面临着食物方程式左右两边结构性矛盾——耕地资源供给已越来越无法满足食物需求的增加。官方数据并未显示中国面临粮食短缺的直接危险,但结构性失衡才是风险所在。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相关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我国耕地面积为 1.19 亿公顷。从绝对数量上看,我国耕地数量还是不少的,仅次于美国、印度和俄罗斯,居世界第 4 位;但从耕地面积占国土面积比例看,我国是一个耕地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仅占 11.63%),该比例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0.20%),远低于印度(49.43%)、英国(24.87%)和美国(18.69%)。如果按照人均耕地面积计算,则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更显耕地匮乏。所以“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不仅如此,耕地面积更呈总体下滑趋势。1991 年至 2018 年,尽管某年份耕地面积实现“逆势增长”,但总体耕地面积已减少 5975000 公顷(见图 1.1)。

除了耕地数量之外,13 亿人的粮食问题与耕地质量密切相关。从国土资源部发布的 2016 年《全国耕地质量等别更新评价》来看,一直不太受人注意的耕地“隐形减量”即质量亏空问题逐步突显,主要表现为耕地质量总体等别低下。中国耕地质量被划分为优等地、高等地、中等地、低等级 4 个等别。调查结果显示,全国范围内优等地只占 2.90%,高等地占 26.59%,中等地占 52.72%,低等地

占 17.79%。其中,54.9%的耕地无灌溉设备,粮食生产科技含量低,“靠天吃饭”。另外,从生态、产能角度而言,坡度超过 25 度的耕地不适宜进行作物种植,应退耕还林。全国范围内,这样的耕地还有 500 多万公顷。耕地质量不高直接制约其生产能力,导致全国范围内能够达到粮食产能每亩 1000 千克以上的耕地不足 7%(国土资源部,2016)。大量坡耕地的存在以及无灌溉设施的自然耕地会造成我国耕地水土不稳定,发生跑水、跑土、跑肥现象,导致土壤耕层浅薄,地力贫瘠,产量低下,极大地影响了我国耕地资源生产潜力的正常发挥。此外,我国土壤养分严重缺乏,污染严重,长期重化肥、轻有机肥,使我国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严重下降,全国耕地有机质含量平均已降到 1%,明显低于欧美国家 2.5%~4%的水平;国土面积超三成遭受侵蚀,现已达到 2.95 亿公顷,遭受重度污染耕地已占 1.1%,特别是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土地遭受镉污染的情况更加严峻;全国水土流失面积 273.69 万平方千米,其中水力侵蚀面积 115.09 万平方千米,风力侵蚀面积 158.60 万平方千米。与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2011 年)相比,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减少 21.23 万平方千米(环境部,2019)。《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根据农业部、环保部公开数据粗略估算发现,按照受损耕地进入“休养生息”的政策,将有超过 700 万公顷耕地进行改种退耕。这其实是个很大的数字了,再计算其他陡坡耕地、湿地耕地等需要退耕土地,这对国家农产品生产和粮食安全的保障无疑是个很大的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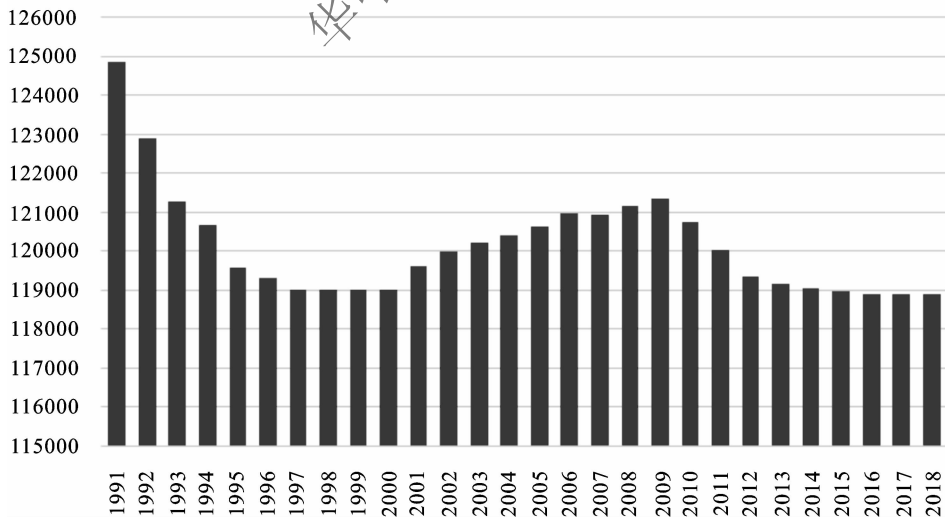


图 1.1 1991—2018 年我国耕地面积(单位:千公顷)

数据来源:FAO 数据库

当一国的农业资源特别是耕地资源的生产能力满足不了农产品需求时,解



决的途径主要如下。需求方面,一是减少和控制人口增长;二是减少食物浪费,提高粮食利用率。供给方面,一是提高耕地单产;二是增加耕地资源国内外供给。通过第一条途径解决供求矛盾基本没有可能,中国人口老龄化使得国家在人口政策上采取根本性转变,推动未来人口的增长。对于第二条途径,国家已经开始关注,但提高食物利用率、减少浪费是一个长期过程,其中涉及引导、改变居民的食品消费习惯,农产品生产、加工、物流效率提高,以及资金投入、设备设施改善等。至于第三条途径,则是中国政府历年来持续努力的方向,并取得了丰硕成果,2019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每公顷5720千克,有的省(区、市)单产甚至达到每公顷7000多千克。不过,耕地单产不可能随意提高,除了与农业生产技术息息相关外,还与当地土壤、气候等水文地理条件紧密结合。我国现阶段的粮食成绩无不是基于高投入、高化肥、高农药的使用。未来受资源约束,中国的粮食单产只能提高15至20千克,单产潜力有限。至于增加耕地资源国内供给,国家已经十分重视。近年来投入大量资金改造中低产农田,死守1.2亿公顷耕地红线。但历史欠账太多,后备资源稀少,不足500万公顷,城镇化发展又决定了建设用地会对粮食生产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直接造成耕地面积减少、粮食供给能力减弱。因此,仅着眼于国内耕地资源是无法解决食物方程式结构性矛盾的。中国未来粮食安全的保障还需要将眼光投向国际。另外,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看,粮食不仅是用来吃的,更是用来平衡势力范围、进行国家博弈的武器,与其被动等待,不如自己主动“走出去”,以资本投入、技术合作、提供援助等形式获取国际粮食供应体系中的话语权。

综上所述,中国的粮食生产已经走了数十年的以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高投入、高产出的快速发展道路。未来,中国必将面临由人口规模扩大、食物链高端攀升、生物能源发展“三驾马车”拉动的粮食刚性需求增大态势。在确保粮食基本自给自足的前提下,投资海外耕地,利用国外自然资源促进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既是权宜之计,更是战略之举。

四、海外耕地投资中国别选择的重要性 ▶▶▶

区位/国别选择一直是国际投资中的重点研究领域。投资能否顺利进行,并取得预期效益,从宏观来讲,直接与区位/国别选择的有效性息息相关。

在其他条件给定的前提下,对外直接投资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区位选择的正确与否。投资主体对外输出资本的根本目的并不是单纯凭借所有权优势进行市场占领和扩张,而是实现投资效益,即获取利润,资本增值。这种目的的达成必须基于特定的区位条件。实践表明,相同的投资项目、相同的运营人员、相同